

关于周恩来精神研究的几个问题

汪 浩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 周恩来精神的提出及其特定学术内涵的确立, 周恩来精神内涵的概括、实质的解读, 周恩来精神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以及周恩来精神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体系的关系等问题, 是周恩来精神研究一系列重大问题。周恩来精神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 是周恩来研究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关键词: 周恩来精神; 内涵; 实质; 意义

中图分类号: A 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444(2009) 01-0001-08

一、周恩来研究的重要成果

周恩来逝世以来, 周恩来研究涌现了许多重大成果, 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关于周恩来的基础研究: 包括传记、年谱、文集, 也包括周恩来业绩家世研究, 这方面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淮安、南开大学的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二是周恩来历史定位的研究, 包括“一个者、三个之一、四个家”及李琦提出的“五大桂冠”(民族英雄、党的领袖、开国元勋、人民公仆、世界伟人), 其标志性成果是江泽民的“主要助手”说, 即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 在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大会上, 确认周恩来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 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当然这里包含了邓小平和杨尚昆的贡献: 邓小平主持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把周恩来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排序调整为紧挨毛之后的第二位; 杨尚昆在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前夕, 著文认定毛是当之无愧的主帅, 周是名副其实的副帅。其三就是周恩来精神的研究。如果说一些回忆性、纪念性文章不能算是研究, 而是宣传(这当然也是必要的), 传记、年谱、文集、家世等研究仅是基础研究的话, 那么, 周恩来的历史定位、

周恩来精神的研究, 标志着周恩来研究迈向学术性、攀登高层次的开始。

二、周恩来精神的提出及特定学术内涵的确定

周恩来精神这一学术概念的提出, 首倡之功应归内蒙古民族大学刘济生教授, 他的《论周恩来精神》一文, 发表于《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年第 3 期。在这篇文章中, 刘教授指出周恩来精神既是一种文化, 又是一种价值, 是周恩来理想、思想、道德、意志、品格、作风的总和。他认为周恩来精神内容十分广泛, 他只是提出一个大概的轮廓^{[1][106][11]}。

刘教授那么早就对周恩来精神作出如此有见地的概括, 实属难能可贵。值得称道的是,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在周恩来逝世最初的 15 年里, 人们常常提起“周恩来的精神”, 当刘教授把“周恩来精神”的命题摆在我们面前时, 很多人还莫名惊诧。时至今日, 一些喜欢察言观色的政治敏感者, 还在窃窃私语: “‘周恩来的精神’到‘周恩来精神’, 这里的玄机……”2006 年一家有影响的刊物硬是将几篇纪念周恩来逝世 30 周年文章中“周恩来精神”的提法改为“周恩来的精神”; 2007 年,

收稿日期: 2008-01-09

作者简介: 汪浩(1942-), 男, 江苏涟水人, 研究员, 主要从事哲学、教育学、中共党史研究。

一家媒体在处理一篇宣传某高校办学经验的稿件时,就是不让提“以周恩来精神育人”。

江泽民在周恩来诞辰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一个重大贡献是对周恩来精神这一重大命题的确认。虽然他论述周恩来精神是从“理想同脚踏实地工作作风”、“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原则性同灵活性”这三个结合的角度,更侧重于阐述周恩来精神的特点,但这毕竟代表中国最高层对周恩来精神的关注,尤其是他肯定了周恩来的“杰出功业和伟大精神”,对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具有的“继续鼓舞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的重大意义,这成为我们今天学习周恩来、宣传周恩来、弘扬周恩来精神的强大推动力,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石仲泉先生对周恩来精神特定内涵的确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论“周恩来精神”》一文中强调了1992年他在《周恩来的卓越奉献》一书中所写下的一段话:“在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各位老一辈革命家都对中国的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都以各自的特色对后世发生影响。这样讲,既丝毫不意味着要有意贬损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们的作用,也不是说周恩来没‘思想’,毛泽东没‘精神’。”讲毛泽东与周恩来,是因为他们俩在这一代老一辈革命家中,共事时间最长,对党的历史发生影响的时间也最长,毫无疑问,这两位领导人对后世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多方面的,但相对来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影响比其精神风范的影响更为突出,周恩来的精神风范的影响比其思想理论影响更为突出。因此,姑且以“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来表明他们对后世影响侧重的力度^{[2][27]}。我们撇开石仲泉先生担心“另生枝节”所作的一些说明,抓住其中的要害,有两点对后来周恩来精神的研究影响很大。其一是把周恩来与毛泽东并提,把周恩来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相对应。毛周并提始于邓小平,把周恩来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相对应始于石仲泉;其二是提出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精神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后世最有影响的两大精神财富的命题。正是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才赋予了周恩来精神特定的内涵,也才使“周恩来精神”这个命题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一个突出的重大命题。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精神的研

究才成为近十多年来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周恩来研究领域一个突出的热点问题^[3]。由于石仲泉先生的这一贡献,有人将周恩来精神的首倡之功归之于刘济生、石仲泉两个人,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关于周恩来精神的研究,还有一位有突出贡献者,那就是梁衡先生。他的《大无大有周恩来》^[4]可以说是唱绝人寰的历史性瑰丽篇章,是周恩来逝世以来周恩来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他的这一成果与前面所说的刘济生、石仲泉二位的成果,共同成为近十多年来周恩来精神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梁先生的这篇论文,有人不把它看成学术论文,而把它看成政治散文。我认为学术论文有三大类,一类是资料见长者,一类是观点见长者,再者是二者兼备者。梁先生的文章没有什么鲜为人知的资料,但他以大无大有这个价值的视角,揭示了周恩来精神的深刻内涵,这篇论文是观点见长的典范。

关于周恩来精神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周恩来的精神”还是“周恩来精神”,认识并不统一,王家云等同志已经阐述了这个问题。江泽民在百周年纪念讲话中讲了“周恩来的精神”,多数同志认为这是江泽民代表全党、顺乎民意,认可了周恩来精神。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看,认为“周恩来的精神”与“周恩来精神”内涵上存在着原则的区别,这就是直到目前,理论界、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的焦点,前面提到的一些现象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微妙性。问题的要害在于把周恩来与毛泽东并提,把毛泽东思想与周恩来精神相对应,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这当然应该引起我们每一个研究者的关注,不应使之成为一种政治倾向。但是不是敏感就不能研究,我们能不能运用我们的智慧,从理论上、学术上来把握分寸,在不触及政治红线的范围内,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可以的,也是应该的。这个问题下文再专门讨论。

三、关于周恩来精神内涵的概括

关于周恩来精神的内涵,目前众说纷纭。刘济生教授首提周恩来精神时,从六个方面作了概括,后来又在《解读周恩来》一书中补充为九个方面:献身共产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实践精神、协调精神、创新精神、高尚的道德、优良的作风。石仲泉先生在《论“周恩来精神”》中,对周恩来精

神从八个方面作了概括:无我精神、求是精神、创新精神、民主精神、廉洁精神、严细精神、守纪精神、牺牲精神^{[2]25-26}。纪念周恩来诞辰百周年之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题节目中播出王家云同志的《试论周恩来精神之内涵》^[5],该文从十个方面概括周恩来精神的内涵:积极进取精神、刻苦好学精神、甘当公仆精神、团结协作精神、求真务实精神、唯物辩证精神、勇于创新精神、严于律己精神、宽厚平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有同志认为他的概括比较精当,但也有人对其唯物辩证精神的提法,积极进取精神与刻苦好学精神等在概念的厘清方面,是否有重复、牵扯等方面提出质疑。关于周恩来精神内涵的概括,你为什么是八个方面,你为什么是十个方面,根据是什么?是越多越全面,还是越少越精当?一时间说不出可供把握的道道来。

拙作《论周恩来精神及其时代价值》一文^[6],力图打破这方面的僵局。该文对周恩来精神的内涵,从六个方面进行概括:务实精神、奉献精神、公仆精神、和合精神、严细精神、修身精神。2003年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就这样的概括有过一段说明:上述六种精神,作者认为已经能够比较全面地概括周恩来精神的内涵。理由是:务实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精神,包括与时俱进和创新精神,诚信精神,愚公精神,尊重群众精神等,这是一切唯物主义者的基本精神;奉献精神,包括牺牲精神,克己奉公、顾全大局、任劳任怨、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无私精神,这是一切以天下为己任,以服务人民大众为人生追求的志士仁人,尤其是共产党员的基本精神;公仆精神,这是共产党领导干部的那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奉献的是奶和血的为民服务精神;修身精神,这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核心是以严格要求自己、正确对待自己为基本内容的加强自身修养的可贵精神,包括进取、勤奋、好学、谦虚、谨慎、守纪、自律、善于总结、善于自我解剖,不断完善自己,使自己多才多艺、坚强、坚韧,能够在不同条件下,不负人民重托,为党为国尽职的精神;和合精神,这是周恩来最富个性特色的精神,即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善于与人相处,与人合作,善于协调,把大家和谐地团结起来,共同工作;严细精神,包括严肃认真、勤恳踏实、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细致周到的负责精神。前四种侧重于一切伟大人物、

中华民族精英人物的共性精神;后两种侧重于周恩来个性特色。不论是侧重共性还是个性,在周恩来身上,都更高、更集中、更典型^[7]。这样的概括不论是否恰当,但我以为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在周恩来精神内涵的分析与界定上,力求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注意讲究逻辑性,体现周恩来精神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务实精神是唯物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具特色的精神,奉献精神是志士仁人尤其是共产党员最具特色的精神,公仆精神是好官尤其是共产党领导干部最具特色的精神;修身精神是一切有责任心的君子、好人,尤其是周恩来这样的克己奉公的伟人最具特色的精神,周恩来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共产党领导干部,人们心目中好人、君子最杰出的代表,务实精神、奉献精神、公仆精神、修身精神再加上最具周恩来个性特征的和合精神和周恩来最典型的工作作风严细精神,已经能够比较全面地概括周恩来精神的内涵了。

四、关于周恩来精神实质的理解

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关于周恩来精神实质的理解,也是如此。石仲泉先生认为周恩来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周恩来精神的真谛^{[2]23}。这样来理解周恩来精神的实质,当然是对的,但作为研究者,并不满足于此。由于分析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就会带来认识上的差异,这是目前关于周恩来精神实质理解诸多差异的基本原因。

诚如刘济生教授所说,周恩来精神的内容十分广泛,以单一的视角来考察、审视,很难全面把握。这里我们来比较前文提及的三位专家的视角和结论:

——梁衡先生“大无大有周恩来”,主要是从价值的视角,突出周恩来的“无私”和“爱民”,爱心博大,覆盖党、国家和人民,唯独心中没有他自己。

——刘济生先生从九个方面概括周恩来精神,但他还认为不够全面,只是概括了一个轮廓。他指出周恩来精神博大精深、至善至美,是我们倡导所有精神中文化底蕴最深的、价值范围最广的一种精神^{[1]12}。周恩来精神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仅从道德上,或仅从政治信

息上,或仅从品格上去理解,就会肢解这一恢宏、博大、至善、纯真完美的价值体系^{[1]121}。他还说周恩来精神博大精深、至善至美、超凡脱俗、感人至深,可谓纳天地之正气,成古今完人^{[1]116}。周恩来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不是抽象物,不是任何时代都能产生的,也不纯粹是个人修养的产物,而“是人类文明积累的成果,是时代的产物”^{[1]1161},显然,这是一种文化的视角,人文的视角。

——石仲泉先生把周恩来精神作为毛泽东思想对应物来考察,还提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周恩来精神“三位一体”的观点^{[2]30},强调周恩来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弘扬周恩来精神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意义,显然侧重于政治的视角。

我们只要仔细地品味这三位专家的视角,就会体会到他们有区别也有共同点。梁先生更侧重于价值,他甚至极言,“实践《共产党宣言》,150年来,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者,周恩来是第一人”^{[4]45}。但他论述“大无大有”时,却又多从文化的角度,比如写周恩来贵为总理,出国时总带一特殊箱子,人家误以为其中藏着机密文件,其实是他换下来需要缝洗的衣服,装在里面,送大使馆缝洗,而不愿“家丑”外扬,揭示拥有倾国之权的总理恪守平民标准和那震撼人心的“平民灵魂”;从中国人爱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的习俗,写周恩来生而无后,但他为关爱烈士的后代,送烈士的子女去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他与斯大林“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人物,达成了最小的协议”^{[4]35};写周恩来以坚定的党性和人格凝聚力,消除了党内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4]39},借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话称颂周恩来“他可能有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些在体现作者价值视角的同时,明显的文化视角的倾向。石仲泉先生更侧重政治的视角,但他也并不排斥文化、道德视角。比如他认为“周恩来精神不应当视为单纯的道德主义的概念”。他还认为,人们用最好的词汇称颂周恩来,这不单纯是一种评论,还表现了一种寄托^{[2]28-29}。他以“立功、立德、立言”是“不朽的盛事”作为周恩来精神论述的引言,表现了一定的文化和道德视角的倾向。不过这样的比较,仅仅是相对而言,不一定很准确。我们这样分析和区分,只

是从他们考察、解读周恩来精神的实际,揭示他们各自的特点,并从中引出下面的话题。

考察、解读周恩来精神实质,常见的几种不同的视角:

——价值的视角,也就是从功利的角度,认为周恩来是志士仁人。古代有“克己复礼”的志士,当代有周恩来式的“克己”,为实现共产主义不惜牺牲一切的“志士”;古代人讲“舍生取义”,周恩来是忍辱负重、超越一切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

——道德的视角。就是从“善恶”的角度,把人区分为“君子”与“小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是儒家衡量人的基本尺度,从这尺度出发,认为周恩来是大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是圣人、是完人。

——文化的视角。就是从人之所以为人最基本的尺度出发,把人分为好人、坏人。文化的角度,就是人文的角度,核心是人性的角度,人道、人伦的角度。陈晋先生认为周恩来是伟人与好人的统一,他提倡从人脉、从“情商”的角度来认识周恩来精神的实质^[8],就是典型的文化视角。

可以说这是人们理解、考察、解读周恩来精神实质的几种基本角度。前面所举梁衡、石仲泉两位专家的视角:价值的视角、政治的视角,都是功利的视角,属价值的范畴;刘济生与陈晋两位专家侧重于人文的视角。

问题是:这样的区分只是就一般人的习惯而言,并不“很科学”。事实上,从厘清概念来说,“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包括道德、价值、政治、伦理、习俗,等等,这就带来了以文化、道德、价值的视角解读周恩来精神实质时,相互交叉、相互牵扯的问题。这从刘济生教授对石仲泉先生观点的理解上可以看出来。刘教授说:“周恩来精神就是一种价值,一种文化现象,那种把这一精神看成是道德的观念显然有些窄了,也有人把周恩来精神解释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榜样,那无疑抽掉了他的精神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感。”^{[1]357}周恩来精神是具有永久意义的价值体系,它是周恩来在长期战斗生活中的理想追求、思想观念、道德品格、工作作风所体现出来的价值^{[1]104}。他不赞成把周恩来精神看成仅仅是一种道德的范型,他批评“立德就是周恩来精神”观点的片面,指出立功、立言都

能体现精神^{[1]103}。这当然是对的,但这段话中显然有对石仲泉先生的误解。石仲泉先生虽然从立德、立功、立言的角度出发,论述他关于周恩来精神实质的理解,他虽然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精神是共产党的道德精华和民族性的高度统一”^{[2]23},但他同时也指出,周恩来精神不应当视为单纯的道德主义的概念^{[2]28}。可见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为什么会出这理解上的误差呢?深究起来,问题就出在审视、解读周恩来精神的视角上。刘先生侧重人文即文化的角度,石先生侧重政治即价值的角度,而这两个角度在概念上又是相互牵扯的:政治与狭义的文化可以并列,但它统属于大文化概念,价值也统属于大文化的范畴,而狭义的文化也体现价值。而且道德观与价值观,又是大文化的核心内容,这种概念上的牵扯,必然带来认识与解读时的牵扯,这就是目前关于周恩来精神实质理解上相互牵扯的基本原因。

那么,到底应如何概括周恩来精神实质呢?应该承认,刘济生教授是较早从人文的视角解读周恩来精神实质的,他的解读比较深一些,全面些。概括刘教授关于周恩来精神实质的观点,主要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认为周恩来精神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价值体系;其次他认为周恩来精神是实践的产物,是通过周恩来的行为体现出来的,“是他在社会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想、思想、道德、意志、品格、作风的总和,因而也是一种广义的文化”^{[1]106}。我认为他的这一解读是比较全面的,但需要作少许补充。其一,周恩来精神还是一种范型——既是周恩来思想、理想、道德、意志、品格、作风……行为的范式化,又是传承者学习、效法的价值范型、人文范型,周恩来精神是这两种范型的统一;其二,周恩来精神还是一种精神寄托,它既是周恩来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理想的追求所凝聚起来一种心理寄托的外化、具体化;而且也是传承者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理想追求的寄托,是一种美好愿望理想化、偶像化的结果。石仲泉先生曾指出,周恩来精神还表现了一种寄托^{[2]29},周恩来精神的实质也是这两种寄托的辩证统一。

综上所述,我认为周恩来精神的实质应强调如下几点:

其一,周恩来精神首先是共产党人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共产党人思想、理想、理念、道德、

情感、意志、智慧、品格、态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周恩来对理想的追求,对真、善、美的追求所凝聚起来的一种心理寄托的外化、具体化,是精、气、神的统一,是公、廉、威的统一,是非权力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又是传承者借助周恩来精神所表达出来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理想的追求,对种种美好愿望的寄托,周恩来精神是这二者的统一。

其二,周恩来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实践的产物。所以周恩来精神既是毛泽东思想的孪生物,又是毛泽东思想的衍生物。衍生物决定了它统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孪生物又决定了它相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独立性,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特殊性。实践性是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精神共同的特征,区别在于毛泽东思想具有逻辑体系性,是以概括本质的概念来表达的;而周恩来精神具有过程性特征,它是通过现象,主要是周恩来的行为来表达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解决的是“言传”的问题,那么,周恩来精神解决的则是“身教”的问题,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

其三,周恩来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西方主要人文精华在周恩来这个伟大共产党人、共产党领导干部、共产党领袖人物身上的升华;是共产党人党性的人文精华与民族性的人文精华的高度统一,是伟人、“圣人”情怀与平民心目中的“好人”情怀的高度统一。因此,周恩来精神具有时间、空间的普适性。这就是周恩来精神广为传颂、经久不衰的本质原因。

其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精神的实质”,这样的概括抓住了周恩来精神实质的要害。文化现象都有核心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周恩来精神的核心价值。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切先进文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弘扬周恩来精神,不仅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最好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为“构建”找到了最有力的“抓手”,为“构建”提供了一个最富说服力、影响力、感召力的榜样和楷模。

五、关于周恩来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涉及。我认为,周恩来精神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这是放在如

下的前提下来认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精神,我们一般把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所以,毛泽东思想涵盖周恩来精神,这是其一。

其二,周恩来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对应物。这是石仲泉先生的贡献,他说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领导人对后世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多方面的,但相对来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影响比其精神风范的影响更为突出,周恩来的精神风范的影响比其思想理论的影响更为强烈。因此,姑且以“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来表明他们对后世影响所侧重的方面。

其三,突出周恩来精神的影响力。王家云等同志指出:“上世纪三大革命产生三位领袖代表之说,一是为了简化历史的复杂性,二是就当时的最主要的历史作用来看的。不过,我们不仅回溯历史的具体,再展望历史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个人对当时和行将对未来产生的影响力(特别是对广大民众和干部的影响力)来看,又不得不单独突出周恩来的巨大贡献,这不仅仅是由于周恩来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领导层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更主要的是他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完美精神、人格魅力对人们所产生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力。革命不仅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也是灵魂的净化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所传承给我们的,不特是一个新中国,还有如何建设新中国而应学习的某种精神。周恩来精神是第一代领袖们所留给我们的最宝贵而又未能引起我们充分重视的财富。这是周恩来精神不能归结为毛泽东思想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因为思想侧重于理论层面,强调的是对全局大政方针的影响力,而精神侧重的是人格道德实践层面,强调的是个体行为选择的影响力。”^[9]

这里引述王家云等同志书稿中的这一大段话,是因为这一大段话不仅充分说明了周恩来精神能够独立存在的理由,而且我们还能就此引出新的结论。革命有两大功能:历史的火车头,灵魂的净化器。中国革命作为“历史的火车头”概念化、范式化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而作为“灵魂的净化器”概念化、范式化的结果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愚公精神、方志

敏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黄继光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周恩来精神是这些精神更高、更集中、更典型的体现。所以,周恩来精神的实质,从哲学层面上来概括,是“历史净化器”的概念化、范式化、典型化。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愚公精神、方志敏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黄继光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周恩来精神是这些精神的集中体现。所以我们说周恩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周恩来精神是毛泽东思想实践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涵盖周恩来精神。但是,周恩来精神又有其独立存在的理由,有着毛泽东思想不能完全代替和涵盖的内容,毛泽东思想与周恩来精神就是这样既统一又相对独立的辩证关系。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来进一步阐述周恩来精神研究的重大意义。如果说从历史性的社会变革的角度、从理论体系的角度,我们找不到能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相对应属于周恩来自己相对独立的位置,那么从精神丰碑、精神偶像的角度,周恩来可以与周公旦、孔子、诸葛孔明、圣雄·甘地相媲美,与一切历史伟人相媲美。周恩来研究开拓了周恩来历史定位研究的新领域、新空间,它找到了周恩来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可以与毛泽东、邓小平相对应属于他自己的独立存在的形式和概念,一种独立存在的话语系统。其次是周恩来精神的研究,使人们对周恩来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对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对周恩来在中国历史,尤其是以后的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六、几点补充说明

第一,我们如此解读周恩来精神,会不会使周恩来偶像化、神化。

这个问题,在论述周恩来精神的不少专家的文章中提出过。我以为,是不是偶像化、神化,关键在于是否迷信。我们理性地、实事求是地概括周恩来精神,恰如其分地界定其内涵,实事求是地给出它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它对今后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这是对先进文化的坚持与弘扬,与迷信无关。弘扬先进文化,往往借助

于对先进文化代表人物如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精神的代表人物周恩来的推崇。这种推崇过分了,会自觉不自觉地转化为崇拜、迷信,这在中共历史上是有沉痛教训的。所以弘扬周恩来精神要防止偶像化、神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现过不适当地抬高周恩来的倾向,90 年代以来也出现过不适当地抬高周恩来精神的倾向;有人不能容忍说周恩来的缺点、失误,有人甚至不提周恩来精神为满足,还要提“周恩来思想”;还有人认为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是“周恩来理论”,云云;这都是不适当的。避免周恩来和周恩来精神的偶像化、迷信化,最好的途径是实践。周恩来精神是实践的产物,弘扬周恩来精神要通过实践来体现。脱离实际的弘扬的必然结果就是迷信,这是我们时时应该注意的。由“周恩来的精神”到“周恩来精神”,这是周恩来精神概念范式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周恩来偶像化的过程。尚美心理与偶像心理,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积极的精神偶像是有意义的,甚至是必须的,必然的。消极的精神偶像是愚昧的、有害的。有人扬言要“推倒周恩来这中共最后一个精神偶像”,我们要维护这一精神偶像。维护的最好办法是防止这一偶像消极化,就是要防止神化、迷信化,而应该人化、具体化、实践化。这包括两方面:一是在理性上承认周恩来是人不是神,只是他比一般的好人、一般的先进人物、一般的共产党人更高、更集中、更典型,周恩来精神是共产党人崇高精神的集中体现;二是学习“周恩来精神”不是要把“周恩来精神”当作坐而论道“虔诚教徒们”口中的教义,而是把周恩来精神具体化为自己的行动,使周恩来的形象时时、处处成为自己的楷模。

第二,领袖人物之间能不能论短长。

这个问题由石仲泉先生提出,前文已引石先生的话“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影响比精神风范的影响更为突出,周恩来的精神风范的影响比思想理论的影响更为强烈。因此,姑且以‘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来表明他们对后世影响侧重的力度”。尽管石先生煞费苦心如此婉转地表达他的意思,但是仍然有人对他的这一比法提出异议。王家云等同志书稿中对此评论说:“也许作者并无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比出高低的意思”,但“提出这样的比较容易产生两种错觉,一是比领袖人物贡献大,二是

产生才德来区分领袖人物的错觉”。我比较赞成王家云等同志的观点,对领袖人物不宜进行不严肃、不实事求是的比较,因为领袖人物的问题一般比较敏感,不严肃、不实事求是的比较容易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石仲泉先生力图婉转,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应该说这方面大多数人没分歧。但话又说回来,领袖人物之间不是绝对不可以比较,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比较又是必要的。因为有比较才有认识,有深入的比较才有深入的认识。毛泽东这一伟大领袖,就是在与其他中共领袖的比较中才脱颖而出的。迪克·威尔逊就曾指出,周恩来认识到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毛泽东比他周恩来更有优势;石仲泉先生说,“文革”中周恩来的贡献最大;力平同志指出,1921—1949 年毛泽东的贡献最大,1949—1976 年周恩来贡献最大,1976 年后,邓小平的贡献最大;刘济生教授指出建国后周恩来的知识分子理论、统战理论、外交理论是当时党内最高水准的……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之间的比较。所以我们不能一般地排斥比较,而且我们还要提倡深入的、实事求是的、严肃的领袖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因为只有这种比较研究,才能促使周恩来研究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周恩来精神就是在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中才提出来的,这一点,王家云等同志的书稿中就已经揭示了,在刘济生同志提“周恩来精神”这个命题之前,群众中早就有关于“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的说法。

第三,提周恩来精神会不会造成“多中心”,造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干扰。

就此而言,说绝对会与绝对不会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实践问题,这需要我们在两个层面上,恰如其分地把握。

首先在理论上,在关于周恩来精神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问题上,必须把握既统一又相对独立这个分寸。所谓统一就是坚持周恩来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其相对独立性主要是在存在形式上、表现方式上、影响的不同侧重方面。其次在实践上,一方面如前所说,周恩来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实践过程中的产物;另一方面,周恩来精神的影响还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及发展进程中。也就是说,周恩来精神过去是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理论体系的促进力量,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周恩来精神已经成为而且还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彻、落实的促进力量。那种企图以周恩来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相抗衡,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相抗衡,搞理论的多中心,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与周恩来本人的意愿、与周恩来精神客观内涵相违背的。

第四,关于“三位一体”的提法。

石仲泉先生在纪念周恩来诞辰 95 周年时曾提出,要使我们的国家在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周恩来精神,这三者缺一不可,这就是他所说的“三位一体”的精神。2004年石先生应邀来淮阴师院作周恩来精神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学术报告,也有类似的说法,但石先生避开了“三位一体”。石先生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就这样来阐述周恩来精神的地位和意义是很有创意的。但现在看来,这“三位一体”的提法可能欠妥贴,将来是否还要提“四位一体”、“五位一体”呢?而且,后来有人在石先生“三位一体”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靠周恩来精神实现的,而且还进一步得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要靠周恩来精神来实现的错误结论。这一提法不够妥贴的根源在于没有深刻理解,没有真正摆正周恩来精神与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这个问题,前文已经说过了。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革命理想,奔向社会主义,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培育起来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愚公精神、方志敏精神、焦裕禄精神……周恩来精神是这些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样,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伟大目

标是民族振兴、实现小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伟大目标的实现,也要靠在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培育起来的以周恩来精神为榜样,以周恩来精神为集中体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精神,舍此是不可能的。这样表达才能避免周恩来精神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互关系不适当的结论。 <

参考文献:

- [1] 刘济生. 解读周恩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2] 石仲泉. 论“周恩来精神” [M] //汪浩. 周恩来研究: 第 1 辑.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 [3] 王家云. 周恩来精神研究述评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6(2): 72-75
- [4] 梁衡. 大无大有周恩来 [M] //汪浩. 周恩来研究: 第 1 辑.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 [5] 王家云. 试论周恩来精神之内涵 [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1998(1): 1-6
- [6] 汪浩. 论周恩来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1998(2): 12-16
- [7] 汪浩. 周恩来: “三个代表”的伟大楷模 [M]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 淮阴师范学院. 周恩来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楷模: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汇编.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31.
- [8] 陈进. 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充分肯定我院学习周恩来活动 [EB/OL]. (2007-06-07) [2007-12-20] http://xyz.hyt.edu.cn/News/content/news/news2007/6-7/2007_06_07_076715053996360.htm
- [9] 王家云, 黄明理, 邵广侠. 周恩来精神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2

责任编辑: 张 超

ABSTRACT

A Few Questions on the Study of Zhou Enlai's Spirit

WANG Hao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Huaiyin, Jiangsu 223001,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Zhou Enlai's spirit includes a series of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the spirit putting forward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specific academic meaning, summariz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Zhou Enlai, 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pirit of Zhou Enlai,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pirit of Zhou Enlai,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concept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hematic and synthesized study on Zhou Enlai's spirit will have a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Zhou Enlai's study.

Key words Zhou Enlai's spirit; connotation; essence; significance

On Several Philosophical Issues about Interpretations of Pascal Probability

LI Xuy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1, China)

Abstract Discussing Pascal probability from the view of philosophy involves the following several issues: monism and pluralism, epistem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s, relations of probability and causality, the Hume's problem which puzzles philosophers at all times and adequacy of interpretations of probability. These issues run through the expounding process of five interpretations of Pascal probability, we yet don't discuss them for each interpretation, but base on actual situations.

Key words Pascal probability; interpretations of probability; philosophical issues

The Im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Marx's Manuscript of Economics-philosophy in 1844

ZHANG Ya-qun¹, WANG Fang²

(1.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2. College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In Marx's Manuscript of Economics-philosophy in 1844, two sorts of logic, includ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humanism logic, were put into presupposition and collision in whic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gic gradually stood out. Then, Marx fulfilled the second transformation of his thought. By the analysis of "dissimilated labor" which looked as if it only belongs to humanism,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e" is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n this basis, with the study of "develop the useful and discard the useless" and "dissimilated labor", we are exploring the substantial proces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lso, during the course, wrapped in humanism, many fundamental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uld be developed.

Key words logic thread; dissimilated labor; practi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arianism

ZHANG Wa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Huaiyin, Jiangsu 223300, China)

Abstract Communitarianism become popular from the 80'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it is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pposite to liberalism. When it is used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make an ethical judgment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irst of all it will emphasize the country's moral status rather than the individual's. Based on the premise, the National Community not only shapes a common identity and recognition among its members, but also defines thei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Community has various moral rights,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self-determination prevented from external interference. At the major ques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uch a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global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above-mentioned position about communitarianism has been manifested obviously. As the international justice concept with a special tendency, communitarianism advocates cultural pluralism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ethics of international coexistence, meanwhile it also has the danger to slide to moral relativism.

Key words communitarianism; community; country's moral statu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distributive justice

Look Bian Shou in from the "Chart of the Family Surnamed with Bian Moved to Huai"

—One of the Studies on the Eight Artists of Yangzhou

BIAN Xiaoxuan

(College of Litera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tracted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Bian Shou in from the draft of "Chart of the Family Surnamed with Bian Moved to Huai". Combined with "Splashed Ink Map", "Inter-Reed House Map" and the inscriptions by some celebrities as